

曹之

## 古代书目编撰的特点

**摘要** 中国古代书目的编撰特点有四,即连续性、时代性、学术性和技术性。参考文献8。

**关键词** 中国古代书目 编撰特点 连续性 时代性 学术性 技术性

**分类号** G257

**ABSTRACT** In this paper,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at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ies have four characteristics: continuity, time, academic and technique characteristics. 8 refs.

**KEY WORDS** Ancient Chinese bibliography. Characteristics. Continuation.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.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.

**CLASS NUMBER** G257

据不完全统计,我国古籍书目有1000多种。数以千计的古籍书目凝结了代代学人的心血,是我国古籍的忠实记录,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文试就古代书目编撰的特点加以论述。

### 1 连续性

历代帝王都很重视书目编撰工作,汉代编撰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时,校勘人员“每一书已,辄条其篇目,撮其指意,录而奏之”,汉成帝亲自审阅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时,清高宗弘历尤其关心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编撰,曾经接二连三地发布圣谕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都是诏令编撰的。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,官方书目编撰就像接力赛跑一样,从未中断。就是在风烟滚滚的战争年代,书目编撰活动亦未尝稍息。在中国书目编纂史上,史志目录的连续性尤为突出。一旦什么时候出现空白,出于强烈的使命感,就会有人站出来填补空白。例如当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没有著录唐代开元以后的著作时,欧阳修在编撰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时,马上补出唐代开元以后的著作28469卷。在二十四史中,只有《汉书·艺文志》等6种艺文志,为此后人做了大量的补志工作,清人的贡献尤为突出。通过众多学者的辛勤劳动,历代艺文志蔚为大观,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。

历代学者都很重视书目编撰工作。唐毋煚《古今书录序》云:“(书目)将使书千帙于掌眸,披万函于年祀。览录而知旨,观目而悉词。”明高儒《百川书志·自序》云:“书无目犹兵无统驭,政无教令,聚散无稽矣。”书目作用如此重要,故古人对于书目编撰一事,每每用心良苦,乐此不疲,稍有积累,辄簿录甲乙。古代民间书目多如牛毛,荦荦大者如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、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、明叶盛《菴竹堂书目》、高儒《百川书志》、祁承燾《澹生堂藏书目》、清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、钱曾《也是园书目》、

等等不胜枚举。明祁承燾甚至要求子孙后代少则五年、多则十年编目一次。古人在书目编撰过程中,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,总是千方百计加以克服。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历经瞿氏祖孙三代50余年的辛勤劳动,始克成功,书目编撰的连续性在瞿氏家族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。

### 2 时代性

首先,书目数量因时而异。时代不同,环境不同,书目的数量也不相同。图书目录是图书的清单,各个时代图书目录的多寡虽由多种因素所制约,但是图书数量起着决定作用。出于管理和利用的需要,一般说来,如果一个朝代的图书数量多,则图书目录亦多,反之则少。纵观古代书目编撰历史可知,南北朝、宋朝和清朝是古代书目编撰的三个高潮时期。南北朝可考书目有42种,宋朝可考书目有104种,清朝可考书目约有380多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原因是多方面的,但是文字载体和图书制作方式的划时代变革是其关键所在。据本人考证,到了南北朝时期,纸张才在全国最终普及。因此,图书数量、图书目录必然随着纸张的普及而大增。雕版印刷发明于唐代初期,它同造纸技术一样,从发明到普及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随着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,图书数量、图书目录的增多也是必然的。继明代之后,清代前期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,刻书地区遍布全国。清代后期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,石印技术名噪一时,书坊所在皆是,图书数量的增长速度更是史无前例,书目编撰的繁荣也就不言而喻。专科性目录的多寡也是因时而异的。专科性目录专业性强,常常与各个时代的学术环境有关。例如南北朝时期佛典目录众多,就与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密切相关。

其次,书目分类因时而异。一部图书分类史告诉我们:图书内容和品种总是不断变化的,书目分类体系应当因时而

异。汉代《七略》六分法曾经独步一时,但是没过多久,随着魏郑默《中经》的出现,六分法已经开始动摇,四分法日渐盛行,遂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战争频仍,但是学术界相当活跃。连年战争虽然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,但却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大串连、大交流、大融合。汉文化在民族文化的碰撞中,不仅没有受到破坏,而且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变得更加充实、更加完美。例如史学方面,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,史书大量增加,《七略》的分类方法已经过时,为史书设立专类已是势在必行。于是四分法书目应运而生,史书开始在书目分类中占有一席之地。四分法始于魏郑默《中经》,唐《隋书·经籍志》正式定型,至清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发展到顶峰。尽管如此,唐以后的1300多年也并不是四分法的一统天下,宋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、明杨士奇《文渊阁书目》、清钱谦益《绉云楼书目》、孙星衍《孙氏祠堂书目》等并没有采取四部分类。历史上大凡好的书目,其分类体系总是追踪时代,因书设类,绝不墨守成规,因循守旧。

第三,书目著录因时而异。自汉至清,历代书目著录方法是有区别的。例如先秦西汉时期,许多图书没有书名,汉人编目时常常需要自拟书名。另外,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字载体多用竹帛,计量单位多用“篇”、“卷”。因此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中“篇”、“卷”混用的情况十分普遍。例如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六艺略中,完全用“篇”作为计量单位的有易、乐、小学三类;完全用“卷”作为计量单位的有诗、礼两类;兼用“篇”、“卷”者有书、春秋、论语、孝经四类。而书类总计云:“凡书九家,四百一十二篇。”可见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,“篇”和“卷”已变成同义词了。纸张普及以后,书目编撰就不存在“篇”、“卷”混用的现象了。随着雕版印刷的初步繁荣,同书异本大量增加,宋代书目开始注意版本的著录,例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中涉及的地方刻本有:两浙路13种、淮南路2种、江南东路2种、江南西路9种、福建路7种。蜀本最多,有数10种。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尤以著录版本著称。以上情况在宋朝以前历代书目著录中是不存在的。历代书目著录有繁、简二途,明代书目著录大多从简,不少书目仅仅著录书名、册数,连著者姓名都略而不录,这在其他朝代的书目著录中是不多见的。清代书目著录渐趋规范,晚清缪荃孙甚至设计了一个程式化的著录格式。这种严整的著录格式在清代以前的书目中是看不到的。

### 3 学术性

章学诚指出:“盖部次流别,申明大道,叙列九流百氏之学,使之绳贯珠联,无少缺逸,欲人即类求书,因书究学。”一部目录学史告诉我们:书目编撰是一项学术性极强的工作。古人把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当做书目编撰的指导思想,书目的类序、按语、解题、分类体系等无不体现学术性。例如,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簿录类类序就详细地论述了隋代以前目录的演变源流。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史部杂传类按语则说明了杂史、杂传的区别和联系。下面仅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为例说明解题的学术价值。该目的解题内容十分

丰富,大而言之,约有以下数端:(1)解释书名;(2)交代卷数;(3)著者介绍;(4)评价内容;(5)剖析学术源流;(6)考辨真伪;(7)述版本沿革。这些解题中体现的学术性,在“总目”中的实例比比皆是,不一一例举。当然,对于一篇解题来说,以上内容往往兼而有之。可以说,“总目”之解题分析出来可视为一篇浓缩的学术论文,合之可视为一部规模恢宏的学术史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由4部44类66属组成的分类体系,基本上涵盖了当代众多图书,类目之间有着不可替代的逻辑关系,体现了当代学人的学术分类思想。以上多例表明,书目编撰绝不是甲乙丙丁,开中药铺,非深明于道术精微、群言得失之故者,不足与此。

古代不少书目的编撰常常与古籍整理相结合,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编撰人员通过整理图书,洞悉图书内容,最后写出高水平的解题,编出高质量的书目。如果编撰人员对图书内容一知半解,甚至一无所知,只能编出错误百出的书目。《七略》、《中经》、《中经新簿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都是古籍整理的产物。历代参加书目编撰的人员多是各个学科的专家。例如汉代《七略》有刘向、任宏、尹咸、李柱国等,其中刘向是著名经学家、文学家,负责整理经传、诸子、诗赋等;任宏是军事家,负责整理兵书;尹咸精通阴阳五行,负责整理数术之书;李柱国是医学家,负责整理方技图书。清编《四库全书总目》,更是人材济济、群贤毕至,纪昀、朱珪、任大椿、邵晋涵、周永年、戴震、翁方纲、朱筠等均为一代学术名家。古代民间书目的编撰者也有不少著名学者,例如南北朝《七志》的编撰者王俭,《七录》的编撰者阮孝绪,隋代《七林》的编撰者许善心,宋代《直斋书录解題》的编撰者陈振孙,明代《世善堂藏书目》的编撰者陈第,清代《经义考》的编撰者朱彝尊,《孙氏祠堂书目》的编撰者孙星衍,等等。清代不少著名学者多受聘于显官政要、富商大贾或藏书家,为之编撰书目,如章学诚、方正澍、胡虔、马宗琏、严观、张舟为毕沅编撰《史籍考》;洪颐煊协助孙星衍编撰《平津馆鉴藏书籍记》;周中孚为李筠嘉编撰《慈云楼藏书记》;莫友芝为丁日昌编撰《持静斋藏书记》;叶昌炽为潘祖荫编撰《滂喜斋藏书记》;缪荃孙为张钧衡编撰《适园读书志》;缪荃孙、章寿康为张之洞编撰《书目答问》;王国维为蒋汝藻编撰《密韵楼藏书记》等。以上事例表明,书目编撰并非易事,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,没有对图书内容的深刻了解,不克成功。学者躬亲编目,并非大材小用,而是最佳人选。并且是一个愿意认真读书的人。这样,编撰的书目就会真正达到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的目的,这是中国古代书目编撰史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。

### 4 技术性

古人十分重视书目的编撰技术。高质量的书目,不仅内容准确无误,而且讲究编撰方法,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。就宏观而言,书目形式即指书目类型。书目类型有两种划分方法:一是按编撰者划分,可分为官修目录和私修目录;二是按内容划分,可分综合目录和专科目录。古代书目

编撰者非常注意各种书目的类型和特点。官修目录具有编目人员多、收录图书广等特点。人手既多,要特别强调编例整齐划一,不是各行其是;收录既广,类目设置要全面细密,做到每一种书都有类可归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就是此类书目的典范。私修目录则要在特色上大做文章,《遂初堂书目》著录版本就是其特色。综合目录,尤其是大型综合目录,工作量大,旷日持久,而且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,要从长计议,不可搞短平快。专科目录内容范围较小,读者都是各方面的专家,要注意在版本和解题上下点功夫,《经义考》就是一个范例。就微观而言,书目形式是指书目的有序化和规范化程度。让我们结合古代书目编撰的实践,从分类、著录和解题三个方面加以说明:

第一,关于书目分类。书目分类是实现有序化的重要手段。书目分类包括分类体系、类序、标记符号等内容。在编撰书目时,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分类体系问题。综合性目录要注意类目的横向涵盖面,专科性目录要注意类目的纵向深度。类目名称要和学术分类相一致,不可另起炉灶,标新立异。类序的作用有二:一是论述学术源流,二是说明类型。历史上不少优秀书目,例如《七略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都有类序。标记符号具有简单易记、便于排架检索等功能。《中经新簿》、《晋元帝四部书目》、《群书四部录》、《古今书录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等书目采用甲乙丙丁标号,《文渊阁书目》等采用千字文标号,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。虽然它们与当今分类法的标记符号相比,还很幼稚,但它们仍然不失为一种发明。《中经新簿》比1876年美国《杜威分类法》采用阿拉伯数字作为标记符号要早1600年。

第二,关于著录问题。著录是书目编撰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著录应做到准确、规范。所谓“准确”,就是要以原书为依据,忠实地揭示其本来面目;所谓“规范”,就是要前后一致,执一而终。认真制定凡例,是实现著录规范化的重要保证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爱日精庐藏书记》等堪称典范。著录内容包括书名、卷数、著者时代、著者姓名、著作方式、版本等内容。书名著录要注意四个问题:一是书名著录应以卷端书名为主要依据。古籍题名位置不一,或封面,或书名页,或书口,或书根,或卷端,比较而言,应以卷端为确。二是不宜删去书名冠词,因为书名冠词往往是同书异本互相区别的标志。三是同书异名应在解题中加以说明。四是没有书名的书,书名可据内容自拟,但应在解题中加以说明。卷数著录要注意三个问题:一是核查目录与正文的卷数是否一致,有录无书、有书无录、残缺等情况应在解题中加以说明。二是计量单位以卷为主。如是排架目录,也可辅以册、函计数,以便内部管理。三是分为正集、续集、别集、附录等几个部分的古籍,不可总计卷数,应分别一一著录。著录著者时代要注意两个问题:一是要将同名朝代加以区别。例如“赵宋”和“刘宋”二朝,不可统著录为“宋”,“赵宋”可著录为“宋”,“刘宋”可著录为“南朝宋”。二是跨时代著者的断代,有以政治活动、写作年代、卒年断代三种方法,可以因

人而异,但对某一著者而言,应当前后一致。著者姓名的著录要注意五个问题:一是著者姓名以卷端姓名为据;二是以字行、以号行著者应著录其字号;三是僧人著者之前宜加“释”字;四是伪书著者之前宜加“旧题”二字;五是著者不明之书,应加以考证,并在解题中加以说明。清代书目著录著者姓名已渐趋规范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可资参看。著作方式的著录要注意两个问题:一是要将编与撰、注与疏、修与纂等易混著作方式加以区别,古籍之“撰”相当今“著”,是最常用的著作方式。二是两种以上的著作方式,应以时代先后依次著录。版本著录要注意两个问题:一是版本著录是在版本鉴定的基础上进行的,没有版本鉴定的深厚功底,就难免出错。二是版本著录的内容应当包括出版年、出版地、出版者和版本类别。其中,出版者还应包括出版者姓名和斋堂室名;版本的名称要规范化,活字本宜分泥活字本、铜活字本、木活字本等。古籍著录除了上述内容外,还有排序、互著、别裁等问题。这些技术性问题,历代编目者都是非常注意的。

第三,关于书目解题。传统看法认为,解题有叙录体、传录体和辑录体三种。我认为,书目解题的分类似可有三种划分方法:(1)依内容划分,有叙录体和单一一体两种:叙录体是指像刘向叙录那样内容广泛的解题;单一一体是指内容单一的解题,它可以是著者小传(即所谓“传录体”),也可以是书名释义、版本介绍等。(2)依著者划分,有自撰体和辑录体两种:自撰体是书目编撰者自己撰写的解题;辑录体是兼辑他人成说的解题。(3)依形式划分,有繁体 and 简体:繁体篇幅较长,简体篇幅极短。不少目录学著作在解题目录之外还提到一种注释性目录(或题解性目录),其实,注释性目录也应属于解题目录,因为注释性目录的内容在本质上与解题目录的内容没有区别,区别只是篇幅长短而已。就内容来说,注释性目录大多内容单一,属于单一性解题目录;就著者来说,注释性目录多为书目编撰者所写,属于自撰体解题目录;就形式来说,注释性目录篇幅短小,属于简体解题目录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1 班固. 汉书艺文志总序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2
- 2 纪昀等.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2
- 3 祁承燾. 澹生堂藏书约. 北京: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7
- 4 曹之.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. 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1994
- 5 陈乃乾. 上海艺林梦忆录. 见: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,北京:中华书局,1957
- 6 章学诚. 校讎通义. 上海:古籍出版社,1956
- 7 叶德辉. 书林清话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6
- 8 王重民.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4

曹之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。通讯地址:湖北武汉。邮编 430072。

(来稿时间:2001-04-02)